

南宋时期的淮扬移民

周运中

淮扬一般指明清淮安、扬州二府，汉为临淮、广陵二郡，唐、宋为楚、扬二州，元代为淮安、扬州二路。本文的淮扬指南宋淮南东路楚、扬二州下辖沿运河的淮阴、山阳、宝应、高邮、江都五县及沿海的盐城一县，这六县在南宋淮南东路中受战乱影响较大，又是今天江淮方言淮扬片地域，因此作为一个研究区。关于南宋移民，吴松弟先生已有专著《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》（台湾文津出版社，1993年版），所以本文尽量选取吴先生没有用到的史料，虽属续貂，亦广见闻，不当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北人南迁淮扬

金人南侵后，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。王明清《玉照新志》卷三录徽州人胡舜申《乙巳泗州录》：“又旬日，上皇（指赵构）移幸而南，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，益知金兵叩城之事。以上皇益南，侍卫自京师而至者益盛。”胡舜申是幸运的，他听说太原失守后，认为“淮泗不可居”，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，船刚过闸，潮水就落了。

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，

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，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。这些京东路（今豫东、山东、苏北部分地区）和宿州（治今安徽宿州市）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，在吴先生的著作第五章第三节移民路线的东线只举了赵构、开封王氏沿汴河南迁和徐州丁谏沿泗水南迁三个例子，上述记载则说明当时沿汴河南来民众数量是巨大的。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“水贼”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，到达楚州鼇潭湖，积茭为城，有部众万余人，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，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，作水寨自保。次年三月水浅，金朝挾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，张荣部大败金军，挾懒奔逃楚州。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，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。

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，吴先生在著作中引叶适的话“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”，此话可能有些夸张，但是反映了楚州（当时治山阳县，今淮安市楚州区）的北方移民之多。洪迈《夷坚志·支甲》卷二记

载符离县(治今安徽宿州市)人吴皋在绍兴初年参加楚州镇抚使赵立军队,据王明清《挥麈录·后录》卷九,赵立是徐州张益村人,团结乡民为兵,率领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南下楚州。《夷坚三志·己》卷三记载淮阳军宿预县(今江苏宿迁市,当时属于京东路)人葛万迁居楚州,绍兴辛巳岁(1161年),倡率同乡子弟成立忠义军,自称统领。

除了汴河、泗水外,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。《宋史》卷三十四记载,乾道五年(1169年)二月乙未,命令楚州兵马钤辖羊滋处置沿海、海盜賊。先是“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,旺寻为金人所获,其徒渡淮南者甚众,故命滋弹压之”。海州(治今连云港市)在绍兴和议中割给金国,绍兴三十一年为宋收回,隆兴二年(1164年)又割给金,海州人多次反抗金人统治,他们通过海路南逃入南宋是很方便的。当时淮河入海处的羊家寨(今阜宁县羊寨镇)因为接纳了大量北方流民,被认为是“奸猾所聚”,钱之望在此整编了两千多名剽悍士兵(见叶适《水心集》卷十八《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》)。

淮人南迁江南

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,《夷坚志·支甲》卷八“山阳痴僧”条记载绍兴兵乱,痴僧逃亡他乡,很久以后回到原先住处,旧日相识者十存一二。王明清作于绍兴己卯年(1159年)的《投辖录》说:“顷岁两

淮喋血甫定,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,视其故业。”《挥麈录·余话》卷二记载廉宣仲在建炎初年从家乡山阳县避寇南去,携资产巨万至临安,遇到兵乱,资产全被劫掠,在旧友的帮助下,买船前往湖州,王明清自注说这是廉宣仲亲口所说。《夷坚志·支甲》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高遭乱流离,骨肉散落,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(在今淮安、扬州、盐城三市交界处)中,险些被盜賊杀掉,幸好被仆人搭救,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,又积累起百万资产。他是侥幸逃生,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。宝庆元年(1225年)楚州为山东土匪李全所乱,南宋不久撤销楚州,直到德祐二年(1276年)元军占领楚州,五十年战乱相连,逃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南宋初年。

周辉作于绍熙三年(1192年)的《清波杂志》卷七说:“扬州仓猝南渡,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。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,有得一囊北珠者。”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,这里的“仓猝南渡”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。当年二月,赵构在扬州,金兵南下,黄潜善、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,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,等到金兵逼近扬州,赵构仓促渡江。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,践踏致死者无数。金人游骑至瓜洲,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,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。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,存活的只有几千人,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。绍兴三十一年,完颜亮南侵,扬

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,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,部分居民逃到泰州。隆兴和议后,扬州有所恢复。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,死不降元,扬州又是“积骸满野”,大量居民逃亡。元代孔齐在《至正直记》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:

女真之寇乱扬州,百里之间
虚无人烟,至隆兴以后复盛,德
祐末兵乱又废。父老尝云,自扬
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,至元贞
以后复盛,至正甲午以后,今如
荒野,不知何时复兴也?

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,《宋史·陆秀夫传》记载楚州盐城县人陆秀夫三岁时随父亲迁到镇江,跟随同乡孟先生学习。景定元年(1260年)中进士后,到扬州的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幕下,后至礼部侍郎。元军占领临安后,陆秀夫等人拥立赵昀、赵昶于海上。祥兴二年(1279年)崖山之战失败后,陆秀夫背着赵昶跳海殉宋,南宋灭亡。

根据《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》,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。吴县《管氏家谱》说其祖先原籍山阳,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。常州《新河唐氏家谱》、江阴《唐氏支谱》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,《润东龔北龔氏族谱》说龔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(今镇江市)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,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,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,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

的。

南人北迁淮扬

江淮民众大量迁往江南后,边区人烟稀少,对南宋防守不利,所以政府多次鼓励江南民众迁往淮南,江南人多地少,有些人也乐意到淮南去开垦荒地。吴先生的著作引用高邮人陈造(1123~1203年)《江湖长翁文集》卷二十七一句话,说淮南路和高邮军(治今江苏高邮县)本来风俗淳朴,“有中原气”,近来“南北杂处”,风俗渐不如旧。“北”指北方南来移民,“南”指江南北来移民,陈造生活在淳熙前后,此话反映了乾道以来情况。关于江南移民北迁淮扬,我在这里补充几条诗歌里的证据:

(1) 张良臣《感旧》:

三十六陂春水绿,四十九年
人事非。

扬子江头永嘉后,吴侬荡桨
北人稀。

这里用西晋的永嘉之乱指代靖康之乱,吴侬指代吴人,这首诗反映靖康元年(1126年)又过去49年后的淳熙二年(1175年),扬州地区已经有很多南方移民。

(2) 陈造《邵伯阻风小泊,赠送行诸公》:

船阁雁鹭洲,人穿鱼虾市。

相逢各吴语,知识十三四。

扬州的邵伯镇(今扬州市邵伯镇)紧邻高邮,是运河边的大镇,陈造在此听到人们相逢讲吴语,反映了南宋中期邵伯镇附近江南移民之多。

(3)文天祥《至扬州》一首诗序:

予方未知所进退,余元庆引一卖柴人至……“何处可暂避一日?”曰:“侬家可。”

扬州的卖柴人自称为“侬”,这是古代吴语,反映宋末扬州的江南移民依然未改吴侬软语。

移民的影响

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,又接受了中原、江南很多移民,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。首先,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,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,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。其次,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,战争中死亡、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,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,原因可能也在这里。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,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,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,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,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。

反复的移民还对风俗产生了影响,叶绍翁(浙江龙泉人,祖籍福建浦城)的《四朝闻见录》卷五《淮民浆枣》条说:

绍兴和议既坚,淮民始(一作“咸”)知生聚之乐,桑麦大稔,福建(?)号为乐区。负戴(?)而之者,谓之“反淮南”。或士民一至其地,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

馈之,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,任南人食之,不取价。或遇父老烹牲于社,即命同坐,有留饷者,即诮:“何为留?”坚却不受。自开禧兵变,淮民稍徙入于浙、于闽,至闭肆窖饭以俟之。既归而语故老,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、剥枣之供矣。

绍兴和议以后,逃亡江南的百姓“反(即返)淮南”,淮南重新繁荣。淮南民众对待来客很热情,这让江南人感到很不好意思,他们要留下钱来感谢淮民款待,淮民坚决不要。等到开禧战乱后,淮民南迁,受到南方人的冷遇。战乱平息后,又有人回到淮南,他们就不再热情接待南方人了。看来移民对各地人群关系的影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乐观,也会加深各地民众之间的不信任。

江南人为何这么冷漠地对待淮扬难民呢?除了江南商品经济发达,民风不如北方淳朴之外,应该还有别的原因。曹树基先生的《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》(《历史地理》第十二辑)一文根据《宋史·五行志》的记载,认为隆兴二年到嘉定二年(1164~1209年),南迁的淮南民众给江南带来过好几次传染病,这可能也是导致江南民众厌恶难民的原因之一吧。其实无论是淮扬民众,还是江南民众,都是战争的受害者。我们在太平盛世的今天,探寻家族源流根脉时,不能忘记祖先们的血泪辛酸之路!

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)